

论晚清民族手工业的变动因子

——以湖南为例

熊元彬

(湘潭大学历史系,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晚清是中国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动时期,是近代工业化、近代手工业等诸多领域的起点。其中,对于仅次于农业的手工业而言,学界已对清末湖南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蜕变等问题进行一定的研究,但对于“大变局”时期湖南民族手工业的变动因子,则尚无专题论述。实际上,随着晚清商品化的发展、商路的变通、商人的助推、政府的倡导,以及军需的促动,湖南等地的民族手工业均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动。湖南民族手工业的变动既受奸商、行会与战争等因素的阻碍,但同时又推动了湖南整个近代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

【关键词】: 晚清 湖南 民族手工业

【中图分类号】 K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2017)06-0080-07

一、内在因子:商品化的发展

手工生产商品化是民族手工业变动的内在因子和根本原因。晚清以前,相对于江浙等地而言,湖南总体上仍处于封闭状态,“其民饮稻羹鱼自治,无秦晋商贾巨万之家,赋税俭薄,才敌江浙一大郡”^{[1](p.21)},甚至湖南全省“向无富商大贾,民间较论贫富,率以租谷多少为等差”^{[2](p.3)}。当时,长沙、益阳、湘潭等地的市场几乎被江浙一带的包卖商控制,他们“来鹿角市之,鹿角、童桥、孙坞皆有庄,庄皆吴客(江浙商人——笔者注)。蚤起收之,饭而止。岁会钱可二十万缗。盖巴陵之布盛矣”^[3]。但是,在区域资源整合方面,湖南还是出现了商品化的发展趋势,如隶属岳州府的平江、巴陵、华容等县民众就大量种植棉花、木耳、葛、苎麻、烟叶、蔗糖等经济作物,这些不仅大多属“市卖长(沙)、衡(阳)”的商品,还远销湖北、江西等省^[4]。

前清时期,相对于临近的贵州而言,湖南的丝织业并不发达,“所产蚕丝极微”^[5]。当时,湖南养蚕缫丝仅存在于少数州县,而不像贵州少数民族那样有着遵义等远销云南、广西等外地市场的府绸^[6]。湖南土绢的颜色有黄、白两种,以及“单、夹数种,出茅田者良”^[7]。即使近代以降,湖南的丝织业仍未得到多大的发展,亦即使是省会城市,“长沙间有育蚕者,缫丝织绢,谓之土绢”^[8]。光绪时期,衡州府属的耒阳县也出现了土绢,“蚕食土桑吐丝,缫而织之成绢,皂白色,俗呼土绢,产县南清水铺”^[9]。

湖南烟草以衡州为中心,南至永州、郴州,北达岳州,向西则延至邵阳、沅州等地。早在乾隆年间,衡阳瑶族等地区就出现了“种烟草者相望”的繁盛现象^[10]。时至嘉庆年间,湘潭土家族、苗族等民族也种植烟草,不仅进行商品化生产,还出现了较大的包买主,“土人种蒿,豫给值山主,谓之佃山。客商贩卖,豫给值种蒿之户,谓之定缙,秋后成捆发行”^[11]。由于烟草种植获利较高,从而推动了湖南烟草业的发展,如嘉庆年间善化县“近年种蒿几成美利,或至废田园而为,一亩之蒿可获利数倍”^[12]。比较利益的促动使湖南民族大量种植烟草,从而为当地制烟业提供了廉价的原料,推动了制烟业的发展。

作为湖南制烟业中心,衡阳制烟业亦最为出名。其他诸如祁阳、邵阳、攸县、茶陵等地所产烟草,也成为衡阳制烟业的原料供应地,产品名曰“衡烟”,远销北京、广东等地^[13]。在兴盛时期,“衡烟”的贸易额可年达数百万^{[14] (p. 230)}。清朝中期,长沙制烟业从福建、江西引进刨丝技术,至清末民初,长沙的刨丝作坊已十分发达,出现了制烟业手工工场。

农产品商业化为民族手工业提供了充足而又稳定的原料,促进了民族手工业的专业化。近代之前,湖南经济作物的商品化有了一定的发展,推动了民族手工业的发展,使民族手工业渐趋商品化。常德的土丝“悉数商贩”^{[15] (p. 21)}。嘉庆年间,湖南冶炼铁矿之后,多“船转运赴湖北汉口发卖”,其生产规模之大,仅辰溪县的采炼工人就“不下万余人”^[16]。此外,在湘潭苧麻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俱岁三州,每亩可数十斤,贩贸南省,获利甚饶”^[17]。岳州的棉纺织不仅属外销型的产业,而且生产规模较大,诚如时人吴敏树所载:最初巴陵“多作小布,幅裁尺许,红之可巾,且以张彩饰棺柱,青者以为鞋带”。当时,长沙市场上有巴陵小布行,“其后二都、三都及冷铺、三港嘴诸处产棉,而一都工作布,绝精匀,谓之都布。二都、三都谓之三都布,男妇童稚皆纺织,布少粗而多”^[3]。近代之后,随着农产品商业化的发展,在一些地区逐步形成统一市场,如 1908 年邵阳武冈州从省内进口商品占 40.9%,而向湖南省内各地输出的商品则占 40%^[18]。

同时,随着西方势力的不断渗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亦逐渐蔓延至湖南等内地。1851 年,湘潭易俗河有碾坊 200 户,粮食生产人员 900 余人,而加工工人则达 4000 多人。长沙素有全国“四大米市”之称。19 世纪末,碾米业进入繁盛时期,主要集中于南起碧湘街,北至草潮门沿江一带,其中又以潮宗街的碓坊最多,素有“米街”之称。1904 年长沙开埠之后,进一步推动了米市的发展,巴陵县城出现了李树记碾米作坊,有旧币 600 元,工人 3 名,年产大米 2000 担^{[19] (p. 80)}。根据统计,1908 年长沙粮食碓坊有 500 多户,较大的碓坊各置五六套设备,操作采用了雇佣工人,已具有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特性。据海关统计,1911 年,湖南全省输出总额为 1864.77 万关平两,比 1904 年增加了 313%。其中,尤以长沙为最,在 1911 年,长沙输出额为 1588.62 万关平两,占全省输出总额 85.2%,较 1904 年增加了 514%^{[20] (p. 2)}。

近代以降,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湖南出口土产品的数量与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在湖南出口土货中,若仍分为四类:一是饮食物及烟草;二是原料或半制品;三是制造品;四是杂货,“则可发现出口货中最多者为原料或半制品”,占 1000 余万两,占出口总值的 80%以上。其次则是饮食及烟草,200 万两左右,占出口总值的 10%;而制造品约占 10%。在原料及半制成品中,“最多者为种子及油料”,占 70%以上,五金矿砂占 20%以上,纺织原料占 10%^{[21] (pp. 4-5)}。

但是,传统行规的制约阻滞了湖南民族手工业的发展。诚如武冈《铜店条规》所指:“百工居肆,各有规矩,以安其业,苟规矩不有,则和气不洽,而竞争起焉。”因此,铜店的铜艺,“居是邦者,不下数十家”,而且由于带徒弟雇工者,“每多竞争,较长计短,致费周旋。爰集同行商议条规,约束人心,咸归无事,庶几和气洽,而业斯安也”。又如,光绪初年长沙《碓户公议行规》所言,湖南“旧称富足,谷米四处流通,碓坊(碓户作坊——笔者注)开设省垣内外,理宜划一。矧关日食,尤系民生,倘无一定之规,殊非交易之道”^{[22] (p. 182)}。

造纸原料有竹料、树皮等。由于湖南属“产竹之地,几遍各县”,尤以浏阳、安化、常宁、益阳、衡山、新化、平江、资兴、城步、麻阳、会同、邵阳、汝成、桂阳、黔阳、攸县等地为最多,“故竹造纸之产量亦最多”^{[23] (p. 1024)}。以至于湖南造纸原料以竹料为主,湘乡县境内生产楮和竹,从而为造纸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其产品有皮纸、素纸和烧纸等数种。宝庆府属的邵阳县,其造纸有黄、红、蓝、白诸多颜色,“多系以竹为之”。又如,邵阳东乡的龙山、中乡,以及西乡滩头、隆回等地,“产竹最繁,造纸因众”^[24]。清末,浏阳每年仅产的表纸产值就有 70 万两左右^{[25] (p. 161)}。

湖南造纸遍及湘水、沅水、澧水、资水等四大区域。当时,宝庆、新化一带,造纸槽户有 3 万多户^[26]。同治年间,桂阳县属的芦村和白水洞等地造纸业较为兴盛。同时,浏阳不但产草纸,而且所产的皮纸质量也甚佳,“肌理甚细,与贵州相似”^[27]。光绪年间,耒阳县人民生产草纸,“取解籜新竹沅石灰池中,造作草纸,为他处所仰给”^[8]。

但是,光绪年间,洋纸开始输入湖南,并且其输入量呈增长趋势,1901 年“洋纸输入,上不过一百余两”,至 1909 年增至 3.3 万

余两,9年内增长了300多倍。时至1912年,更是增至12万余两,三年内又增长了4倍。洋纸多用作印刷,不但年均输入量达2万余担,占洋纸输入额的90%以上,而且50%以上为日产洋纸^{[28] (pp. 157-159)}。

造纸业的发展促进了印刷业的商品化。长沙、茶陵、宝庆、永州是清末湖南的四大书城,在江南享有名气。光绪年间,邵阳雕版书业发展到最高峰,城内雕刻业经营户有20多家,刻印工人近3000人,其中,雇工较多的有“经纶堂”“经元堂”作坊,多达200余人,最少的雕版作坊也有30余人。雕版书肆在外埠还开设有分店,如狮子街的彭泽生就在汉口设有庄房。清末,湖南雕版书业不但规模之大,而且分工之细,专业性较强,有裁、印、排、折、订等各专业性人员负责的工序。其中,“经纶堂”作坊雕刻的版片素有“经纶天下”的美誉,仅负责校对的工人就达60余名,其中王慧卿、刘坤生、文肚子、蒋“瞎子”被称为“三个半神仙”,刻有《伤寒论浅注》《白虎通》《孔子家语》等为人称颂的佳作。宝庆是湖南乃至全国的坊刻本产地。1892年,宝庆府属新化县开始出现“坊刻本”,又名“书商刻书”。新化县城“文德堂”“琼林堂”“文元堂”等书坊通常刊印《增广》《三字经》等启蒙教育书籍,以及通俗易懂的唱本和直行的旧账簿。其中,规模较大的坊刻本位于新化县城北门外西畚馆的“三味书局”。该局有刻工100余人,采用木板复刻古籍书,并聘有专家学者校勘,其出版的线装书有经、史、子、集^{[29] (p. 466)}。

专业户的增加是商品化重要的表现之一。清末十年,长沙注册的手工行业达45个。据1912年北京政府在商部的调查可知,湖南民族手工业作坊有400多家,从业人员一万余人。其中,长沙有3家绣庄,绣工1274人^{[30] (p. 231)}。19世纪末20世纪初,隆回滩造纸作坊80多户,工人900余名,1902年经岳州、长沙两关输出纸的总产值就达1483关平两。民国初年,浏阳唐氏的古山牌贡纸还远销东南亚等地,但均采用手工生产,直至1912年才由官商合办了“华丰造纸厂”,从日本购置设备,开始采用机器造纸^{[31] (pp. 11-13)}。

鸦片战争之后,湖南民族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加快了速度,其中尤以制茶业最为突出。据统计,1861—1880年,湖南输出的茶产量年达100余万担。从制茶业的规模来看,仍有较大的发展,如仅安化的茶庄就达80余户,每户雇有300多名工人从事拣茶、烘焙、筛等工序,其砖茶首先经洋行收购,然后出口,全县茶工人数“五六万”,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工场民族手工业特征。此外,醴陵、平江等地的“茶庄数十所”,仅拣茶这道工序的贫民妇女就在2万人左右^{[32] (p. 2)}。当时安化的茶庄有80多家,每家雇工300余名,从事拣、筛、磨、捞等分工,专制砖茶,然后由洋行收购出口。

光绪初年,猪鬃业成为湖南新的民族手工业。在广东经商的湘潭人了解到猪鬃可用作制造毛刷之后,在湖南大量收购猪鬃,从而在湖南兴起了猪鬃业。当时,规模较大的猪鬃业有何益盛、周乾裕、朱洪盛、邱合盛等商行。据统计,湘潭全年加工整理的猪鬃量就达2000担,每担售价100—200元,不但运销本国,而且有1000多担还转销日本及欧美各国^{[33] (p. 561)}。

商人雇主制迅速发展是商品化发展的表现。清末,湖南汕号、茶庄、夏布庄迅速发展,不但数量多,而且资金雄厚。光绪中叶,安化茶号达100家,“金融活泼,农村繁荣”。就经营模式而言,茶商已采取了西方的股东制,就资金而言,单独经营者“每号资本由数千元到十万元,专收买红黑茶,分别精制”^{[34] (p. 25)}。1912年,湖南民族手工业海关出口总值达290万海关两,是湖南省出口总值的22.5%。

二、助推因素:商路的变动

近代商埠、铁路、公路等新型商路的出现是民族手工业商品市场的助推因素。鸦片战争前,中国仅有广州一地通商口岸,而湘潭则是全国进出口的中转站,不但“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然后再由湘潭分运至内地,而且“又非独进口货为然,中国丝、茶之运往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转销至广东,再行出口。因此,在湘潭与广州之间,“商务异常繁盛”。近代之前,“交通皆以陆”,凭借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南风岭地处湘潭与广州中央,是两地往来的“必经之孔道”。南风岭及其附近的居民,“咸籍肩挑背负以为生,安居乐业,各得其所”^{[35] (p. 46)}。当时,湖南的药材较多,无论是运销西北的货物,还是从印度、越南、泰国、缅甸等国输入的药材,也都集散于湘潭。据《湘潭县志》所载,每天来自国内外的舟轮,“自杨梅洲至小东门岸,帆樯集连10里,厘市日增,蔚为都会”^[36]。

由此可见,近代之前湖南是中国内地的重要通道。洋货从广州北上,经五岭、郴州,再至湘潭集散,分销各省;而各省土货则先集中于湘潭,然后经郴州、五岭而达广州,分运出洋。如湖南的桐油,会集于湘潭之后,除了本地消费之外,其余则分销各省,以至于“湘潭经营桐油者极盛,设行二十余家”^{[37] (p. 73)}。

但是,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被迫将广州一地的通商增为五口通商,从而改变了商路,使湖南地区,特别是湘南、湘中地区的运输工人大量失业。全国的商业重心已从广州转移至上海,“外洋商品也大部不再逾五岭陆运入湘,而改由海道北运;云、贵等省物产亦改经广西梧州外运至香港放洋”。1861年,汉口开埠后,山西、山东、河北、陕西、甘肃五省的货物“也多改道由汉口顺大江外运出洋,不再南经湘南”^{[38] (p. 95)}。

1851—1874年间,湖南区域外市场受阻,“华南内地商路,因之亦多阻断,广州逐渐与外界隔绝,除了五岭以南毗连该地之腹地以外,商贾咸裹足不前”。湘西洪江自古就与邻近的贵州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然咸丰初年因长江不靖而阻滞不前,大量土产滞留洪江无法贸易。咸同战乱之前,湖南所需的盐百分之七八十来自淮盐,当时商民可贩运煤炭、桶茶油、纸铁等土产至汉口,以易盐而归,但之后,因“贼窜湖广,扰江皖”,从而使广东与武汉等地的商路受阻,不但“江淮道梗,淮南片引不到”,而且“两粤多故,粤引亦不时至”,继而使盐价暴涨,不但农民的土产无法售卖,而且商贩亦深受其害,“商贩贸迁阻滞,生计萧条,向之商贾今变而为穷民,向之小贩今变而为乞丐,如是而商困”^{[21] (p. 592)}。

咸同战乱造成的荒芜区域,粮食需求量自然减少,从而影响了商路的发展。“茶不再取道扬子江这一条危险的路途”,而是辗转于“山路而来”,途经安徽、江西、福建和浙江的山路,“并在上海找到了一个市场”^{[39] (p. 524)}。但是,咸同战乱时期,仍有部分地区的民族手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如地处湖南东南部的醴陵,其民族成分复杂,“土瘠民贫,素非商贾丛集之所”,但自咸丰三四年之后,因洪秀全“东下,大江梗塞”,凡是江浙闽广川黔,其“诸商贾率道乎是。舟车往来,络绎不绝”^{[38] (p. 246)}。

随着上海、南京、汉口等商埠的洞开,湖南商路在全国中的地位渐次衰落。咸丰以前,商民贩运煤炭、竹木、谷米、纸张、铁产品、桐茶油等“远赴汉口销售,易盐而归,分销各岸”^{[21] (p. 592)}但咸同战乱阻塞了楚粤商贸往来,因“商贩不通”,以至于大量木材、桐油等商品滞留于洪江,如盛产木材的辰州,同治初年由于“匪踪滋漫,焚斫殆尽,即有较为完善之区,而兵勇进剿,沿河一带,亦经伐尽无遗”,从而使木材的价格“较从前昂贵至六七倍之多,商贾亦惮于艰险,裹足不前”^{[21] (pp. 592-593)}。又如,湖南的桐油不能远销江苏等省份,以至于“江苏油贵至每百斤易银六七两”,而滞留在洪江的桐油则只能以“每百斤不过一两六七钱”^{[40] (p. 61)}的方式贱卖,同质同量的产品价格形成极大的落差。汉口开埠后,成为长江中下游的集散地,湖南的鞭炮在汉口设“瑞华祥”“廉达利”“绥丰泉”等分庄,同时湖南植物油、茶叶等亦大多“运至汉口,转售外商”^{[41] (p. 123)}。湖南桐油以外销为主,白桐油多汇集于汉口,然后经洋行出口,红桐油则汇至镇江等处,销售地为国内市场。总体而言,湖南有三个集散地:其一,从沅水流域集中于常德、洪江;其二,从澧水流域运出,汇聚于津市;其三,从湘江流域输出,汇聚于长沙^{[24] (p. 183)}。就贸易量而言,津市的桐油贸易仅次于常德。清末,桐油“集散量1万至2万担”^{[42] (p. 110)}。

衡阳是湘南的商业中心,周边各县的茶油等土产均经此地,然后转销省内外。1842年,五口通商之前,桐油几乎无出口贸易。当时,湖南桐油的商路主要有两条。其一,从湘水流域的湘南诸镇经湘潭,然后至汉口,或从沅水流域各镇聚集于常德,再至汉口,最后分销山西、湖北各地;其二,除了“生洪”“水秀”“中秀”在汉口销售之外,“熟洪”与“尖秀”的桐油不但产量较大,而且品质最优,以致“大多数集中于镇江”^{[43] (p. 59)},从湘西洪江、常德经汉口进入镇江,然后转销江北一带。但是,五口通商之后,输入湖南的商品日渐增多,而湖南的茶叶、瓷器、木材、桐油、夏布、土纸、鞭炮的输出量也有所增加。为了市场的需要,湖南桐油的商路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除了洪江至镇江的销路未变之外,湘水流域的桐油则不再集中于湘潭,而是汇聚于长沙,转至汉口,然后再转销出口。

商埠的洞开推动了湖南民族手工业的发展。岳州、长沙开埠之后,常德、湘潭被辟为“寄港地”。其中,1899年岳州开埠后,常德、湘潭曾一度从长沙改为从岳州出口,但1904年长沙开埠后,则又回归从长沙直接出口,而不再经汉口转运。此外,湖南其他各地的商路也有所变化,如岳州开埠前,澧水流域集中于津市、资水流域集中于益阳,然后再从岳州运至汉口转运出口,但岳州开

埠后,则直接从岳州出口,而不再经汉口转运。沅水流域则汇集于常德。广州开埠后,湖南所产的“湖红”吸引了大批客商。他们不仅在湖南大量收购“湖红”,还将其技术改良,然后再将其转销至欧洲等国,从而使湖南茶叶出口量大增。其中,广东客商首先在安化制茶技术上进行改良,然后长沙、浏阳、新化、益阳、平江、湘乡桃源等地也竞相仿制,从而推动了湖南红茶的发展。据1871年《平江县志》所载,早在道光末年,湖南“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就种植情况而言,凡是山谷间,之前种植红薯的地方,“悉以种茶”^{[21] (p. 482)}。

商埠的开设加强了各地的商贸往来,而铁路的新建则如虎添翼,二者共同促进了商贸的发展,使自然经济逐步解体。1899年湖南岳州开埠,1904年长沙开埠,1905年湖南开通株萍铁路,1911年又开通长株铁路,从而便利了商贸发展。相对于新型的铁路而言,商埠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如1900年不但岳州贸易总值仅有14余万两,而且1904年省会长沙的贸易总值也只不过280余万两,但是,1905年株萍铁路通车后,岳州、长沙的贸易总值合计则达640万两,较1900年岳州贸易总值增加了40倍。1908年,岳州、长沙的贸易总额更是增至1200多万两,在1905年的基础上再次增加了1倍。长株铁路通车次年,岳州、长沙两关的贸易合计更是高达2830多万两,再次在1908年基础上增加了1倍^{[20] (pp. 1-2)}。

湖南商埠的开设,使机制洋纱得以大量输入,推动了湖南棉纺织的发展。1900年,岳州关棉纱输入量为573担,时至1903年岳州仅销售的洋纱就约增至9000担,其中转销内地者2300担^{[44] (p. 30)}。同年,长沙关棉纱输入量为3445担。之后,岳州、长沙两关“历年输入增加”。长沙开埠后,日英美等国纷纷至长沙开店,从而使长沙北门、朝宗门,以及大小西门外,“市面大兴,小轮络绎,颇有蒸蒸日上之象”^{[45] (p. 51)}。民国初年,在政府鼓励发展实业和全国倡导“国货运动”的强烈影响下,洋纱进口量明显下降,而上海等发达城市所产的国货则逐步转销全国各地。如1912年,长沙关进口洋纱量已减至2144担,而国产纱则达7366担,进口的棉纱“大都为织布原料”^{[46] (pp. 45-46)}。

虽然印度纱在中国的绝对地位一直持续至1924年,但自20世纪初日本纱已逐步取代了印度纱在湖南占据首席的地位。例如,在岳州进口的9000担洋纱中,日本纱占1600担,而印度纱则仅有663担,岳州销售日本纱“约居二分,印度纱约一分”。20世纪初,日本纱已取代印度纱在湖南的地位。当时,常德、岳州、澧州等地的织布者,“近来全系参用洋纱”^{[43] (p. 30)}。由于土纱织布虽结实耐用,“却不美观”,而且与土纱与洋纱混合织成的布相比,“其生产成本极高”,因而“仅仅是用土纱织成的土布现在已经很少了”。土纱与洋纱混合织成的布,不但体重轻,而且“又结实又匀细,所以最为行销”^{[21] (p. 459)}。这种洋纱混合织成的布经染色之后,不仅在内地销售,还“复运出口销售”^{[47] (p. 44)}。据1908年估计,之前岳州每年产量2万匹,常德更是高达60万匹^{[21] (p. 459)},但相对于土纱而言,这种混合织成的布的确“厚暖则不足”^{[43] (p. 30)}。

在进口洋纱的同时,商埠还进口洋布,继而使土布与机织布在激烈的竞争中推动了土布的改良。在洋纱进口量增加的同时,棉布进口“数量亦逐年增进”。由于进口的洋布“幅门较宽,品质亦细”,为土布“所不及”,因而“采用厂纱织布进而至土布之改良”。如“加阔”布匹的幅门,并将旧日的产销组织从家庭工业“扩大为机坊工业”。当时,长沙、湘潭、邵阳、芷江、洪江等地“均有设立”机坊工厂。1921年前后,湖南“机坊工业”“已极发达”。同时,湖南改良布还采用脚踏铁木机,使土布品质得以提升,特别是平江布更是“著闻于全省,即为此种改良之结果”^{[44] (pp. 45-46)}。

岳州向来是湘北的民族手工业枢纽,尤其是布坊、米坊、染坊等更是远近闻名。岳州开埠前,其关内的城陵矶只不过是一个“异常寂寞”之小镇,但开埠之后,商人不断增多、商船可谓往来如梭,以至于“生意顿盛”,洋布丝绸皆由此入口,其中仅洋纱一项,“每日所获,综计不下三四百金”^{[48] (pp. 192-193)}。据1911年统计,长沙当时有诸如享誉盛名的英国亨达、太古、怡和洋行,美国的恒信、美孚没有公司,以及日本的中岛、山本洋行和德国的瑞记德孚洋行等,合计为22家,洋商168人^{[49] (p. 117)}。

岳州、常德除了输入洋纱、洋布之外,还有染料、药品、等日用品,但几乎无机器设备,而输出的只是诸如茶叶、桐油、茶油、苎麻之类的农产品和一些煤铁锰矿等矿产品原料。据统计,长沙开埠不久,英、美等国洋行就以每吨53两银贱价向“水口山”订购了一万吨黑铅砂,并以20两银每吨低价购买了4000吨白铅砂。双方规定:“伺候铅砂即以此为定价,不得卖与别行。除如约开采铅砂外,并不得提炼成铅。”^[50]从而垄断了这里的铅砂。

三、主体因子:商人的助推

近代商人既是经销商,又是生产者,是民族手工业变动的主体因子。近代之前,封建政府力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的地位极为低下。近代之前,桐油商人多来自祖传或贫困子弟拜师学徒者,也有极少数弃学而经商者,但之后桐油商人的成分则明显发生变化,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三种来源:其一,清军复员的将士和太平军失散的士兵。如洪江庆元丰老板刘岐山在 1860—1865 年间,曾在太平军充当士兵,但在九江北岸作战之时,由于与太平军失散而离开队伍,专为经营桐油。其二,虽经儒学熏陶,然不愿入仕途的桐油商人。如洪江杨恒源油号老板杨竹秋,在幼年读书而至政法书院,并成为秀才,但民初湖南都督谭延闿劝其从政之时,“他婉言谢绝”^{[51](p.96)}。专门从事桐油业。其三,虽步入仕途,但之后退而经商者。如庆元丰油号刘岐山之子刘慎伯,本为优廪生,曾任洪江保管局局长和洪江商会会长,但后弃仕途而经营桐油。其四,集官商于一身者。如洪江张积昌油号老板之子张秩永,不但经销桐油业,而且本为“捐员外郎”,出任广西道台,“雄心勃勃,企图在辰溪南庄坪新辟市场,修建一条街,建房数百幢,免费供外人迁往经营”^{[52](pp.128-129)}。

丝绸、茶业向来是中国出口的主要产业,而湖南茶叶的大量输出则属晚清。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两粤茶产不多”,因而列强“爱由粤商赴湘示范”,从而使湖南安化茶农“改制红茶”^{[21](p.481)},继而使湖南茶业得以大量输出。1858 年,粤商佐帆经湘潭抵达安化,传授红茶技术,使安化茶农改制红茶,“转输欧、美”。由于获利甚丰,安化各县竞相仿制,产额日多,这不仅成为安化红茶制造的起点,而且“亦即浑南茶对外贸易发展之嚆矢”^[53]。

近代之前,贩运茶叶者“多系大商”,而之后随着列强势力的渗入,代理商“又多领洋人本钱”^{[54](p.5)},将湖南茶叶运销国内外。太平天国结束之后,湖南“茶运稍畅”,“洋商续在各口岸收买红茶,湖南北所产之茶,多由楚境水路就近装赴各岸分销”^{[21](p.483)}。近代以降,衡阳民族手工业得到较大的发展,衡州城内有专门的烟墨作坊,“衡商得其专利”。据统计,衡阳的制烟业有九堂十三号,每堂每年资本收支 10 多万金^[9]。近代引进股份制之后,茶商多采用股份制经销茶业。单独经营茶业者,每号资本有数千元至十万元,“专收买红黑茶,分别精制”^{[55](p.25)}。

商人致富之后通过募捐等方式兴办公益事业,从而促进了传统“在商言商”向“在商亦言政”双重角色的转变,“举凡地方公益事业的兴办及各项募捐,莫不以洪油业为主”。如 1880 年开办的育婴堂,张积昌油号捐款额达 1800 两银,可谓“独占鳌头”。在赈饥救灾、建渡修桥、防火建设和购置器材等方面,“洪油业无不乐捐巨款,名列榜首”^{[53](p.133)},从而使近代湖南交通更加便利,促进了商品发展,如航船业,1899 年经岳州关的船只仅有 12000 多吨,但 1904 年长沙开埠当年,长沙、岳州两关的船只就增至 100 万吨^{[47](p.39)}。

湖南近代棉纺织的发展得益于谋生者和专业性商人等群体助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在华大量设置纺纱厂,继而逐步取代了印度纱在中国的首居地位。据岳州访函可知,自设立海关以来,经销洋纱的商人“生意颇盛”,因为“洋纱价廉省工,织出之布,匀净光洁,四乡贫家妇女,必借此谋生”^[56]。所以,“洋纱一宗,尤为畅销”。当时,岳州经销洋纱者有 45 家。除了谋生者经销洋纱之外,专业性的商人更是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如岳州海关所载,湖南人“爱买东洋纱者多,缘该商行之经理人,甚讲求推广销路”^{[57](p.28)}。

商人势力增强后,就出现了“在商言政”的局面。近代以降,湖南茶叶商人不断壮大,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外语知识和商业实践,因而很难在市场上竞争,于是试图以政治为突破口,请求张之洞在两湖书院增设“泰西方言和商务”,以此作为两湖“茶叶贸易的一个措施”^{[19](p.175)}。商人的这些建言为张之洞所采纳,张之洞由此决定每年招收 40 名茶商子弟,由茶商出资,兴办自强学堂。1911 年 6 月,焦达峰在汉口与刘肖堂和浏阳布商周海文将夏布运至汉口,在谈及加入同盟会湖南分会之时,均表示:“出质布匹,得金分配各机关。”^{[58](p.251)}可见,商人不但参与政治,而且推动了民族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如长沙光复前夕,革命党人曾杰、黄昌濬、李洽等四人自制炸弹,其中,弹壳由黄昌濬在长沙城堤的“义记灯铺”定做,然后其他程序则分配至各灯铺制造,从而在 48 小时内赶制完成。

1910 年,新化铁商苏代艺、攸县铁商萧敦泰、茶陵铁商李金生、安化铁商梁伯佑等联名上书湖南咨议局,请求废除厘金制度,以便“剔除救弊”,发展实业,促进贸易。从《湖南省咨议局第一届报告书》可知,他们对厘金税局进行批判,认为攸县等厘金税卡对沿途的货物进行验票,运至湘潭更换大船过载之时,还须缴纳“过担之厘”。之后,又须抽“落地之厘”“出口之厘”,甚至在每个巨卡之时,“非多给局丁规费,往往以少报多,浮收无厌,欲壑不填,彼必勒令搬舱,留难数日不验”^{[59] (p. 103)}。

外商的刺激促进了湖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02 年,龙湛林、王先谦等人在湖南首创了阜湘总公司,即湖南炼矿总公司,同时黄忠浩、喻光容还集股创办了沅丰公司。清末,长沙铜官陶业繁盛之时,“各省陶商至铜官订货者云集,为长江流域陶业之冠”^{[60] (p. 109)}。商人将洋货转销至湖南等地,促进了湖南织布、成衣、袜业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不断渗透,传统的牙行逐步成为外商的代理机构。据统计,1867 年长沙的牙行达 95 家,按其经营可分为三类:其一,替生产经营者代销的牙行,这些牙行的仓库和栈场均较大,如长沙的粮本行;其二,代购代销的牙行,这类牙行资金较为充足,可为各地代购代销各类产品;其三,替买方代理的代理牙行,双方订有契约,如产品质量、数量、价格及交货日期等均列入契约之中。光绪年间,长沙不仅各种店铺、行栈均有所增加,还形成湖南全省的茶叶、粮食最大集散地。1912 年,湖南全省民族手工产品出口海关总产值达 2899158 海关两, 占全省海关出口总产值的 22.5%。同年,湖南的矿业出口总值仅有 428922 海关两, 仅为全省出口总值的 3.3%^{[61] (p. 1016)}。可见,1912 年湖南民族手工业出口总值是矿业出口总值的 670%。

商会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社团组织,是适应经济正常运营的商业机构。中国商会最初出现于鸦片战争之前,当时英国商人为了掠夺原材料,倾销工业品,从而在广州设立了英国商会和洋商总商会。20 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封建性传统的行会制度严重束缚了民族手工业的发展,从而为商会的出现酝酿了土壤。为缓解财政危机,清政府推行新政,施行了诸多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措施。1904 年颁布《钦定大清商律》,首次在法律上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承认了商人的合法地位,为商人及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政治性保障。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鼓励下,1903 年湖南设立了半官半商、兼具工商行政官吏职能的商务总局。

“在商言政”体现了商人地位的变化,以及与政府的关系。1906 年,湖南政府选择大盐商郑先靖为第一届总理,正式成立了纯属商办的商务总会。1907—1909 年湖南政府又先后选任从事绸缎、兴建大煤栈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陈文玮为第二和第三届总理。1910 年,湖南设立全省性的工业总会,其宗旨在于摆脱行会束缚,使其具有管理民族手工业的职能。据《湖南工业总会第一届报告书》公会总章规定:“除工界造出货品售出时应归商会管辖外,所有男女手艺大小工匠,机器制造各公司所店厂馆社暨艺徒等类事务自应归公会经理。”可见,民族手工业者已开始用独立的组织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资本家则甚少涉足工业总会。

据统计,在长沙、湘潭、善化、浏阳等四县,工业总会的会员达 86 个,而且很难发现一个稍具影响的近代资本家,而可考证,并具有影响的民族手工业者则有 8 人。这些具有影响的民族手工业者担任了工业总会的要职,如浏阳西乡夏布商师达武就任工业总会庶务一职,另外一个民族手工业者师立道任工业总会调查。他们积极响应湖南光复的号召,为军政府极力筹款,其中有的用契据抵押,有的按铺户资本酌派,有的则由于个人仗义集合资本,“纷纷筹助,各有争先恐后之心”。极力援助武昌起义,如鞋业公所,仅在三天之内就赶制了 3000 双军鞋。虽然就组织而言,工业总会有别于商会,但在工商业的合力作用下,湖南商会还是有了发展,时至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湖南共出现了 15 个商会^{[62] (p. 76)}。

但是,在助推的过程中,奸商与行户相互欺瞒却制约了民族手工业的发展。茶业行户规定,凡是茶价,“商人应给行用钱”,并定为 30 文,但在“产户茶价内”则每串扣钱 50 文,“以给行户”。同时,“行户又瞒商人”,在茶价内每串多取 50 文“背手钱”。此种欺瞒被揭露后,“商人不准行户收取,亦不归于产户”,而转归商人照常收取。因此,“奸商恶行,变易成规,侵渔乡民,深堪痛恨”^{[21] (p. 482)},严重地影响了民族手工业的发展。

四、引导因子:政府的鼓励

政府与商人都是推动民族手工业变革的重要因子,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但作为经济变动的执行者,在诸多措施方面,政府的作用更大,特别是在晚清官督商办的过程中,可以说更是起着引导性的作用。咸同战乱之后,湖南政府采取了一些安抚人民的措施。据时任衡州知府的胡文炳所载,咸同战乱“事定之后,余察此情,乃为公示”,于是劝民栽桑种棉,“以为布帛之本”。同时,胡文炳还“虑空言之无益也”,捐钱制 300 余具纺车,分散城厢内外,并指出“今衡商妇女教之纺。又虑其纺成而无所集也”,于是发 500 串钱,专门招募甘广生、谢连顺等衡商,“开机坊招机匠,以终具事”^{[63] (p. 32)}。

1874 年,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之后,整顿西北茶务,实行票法,招揽商贩,除了之前陕西、山西茶商(东柜)与回商(西柜)之外,还招徕湖南茶商,大量贩运湖南茶叶^{[64] (p. 15)}。从此,湖南茶叶经西北远销俄国境内,在晚清时期处于鼎盛时期。据调查,在鼎盛之时,湖南茶产量约 100 多万担,其中仅安化东坪、黄沙坪、酉州等地的就有 80 多所茶庄,年产七八十万箱。就销售而言,销往俄国的湖南红茶约占 70%,销往英、美占 30%。之后,随着两广经济的发展,湖南红茶经香港转销至英、美增至 40%,而 60%“仍由恰克图销于俄国”^{[21] (p. 481)}。

在清政府推行新政,鼓励发展实业的倡导下,部分商人、地主及官僚纷纷投资民族手工业。其中,湖南宁乡县的制锅业就是由光绪中期安化、益阳铁商兴办起来的。1906 年,熊希龄创办醴陵瓷业制造公司。当时醴陵瓷业“恃以为生者无虑十万人,然瓷商类多设厂自制,他业亦然”^[65]。即使是湖南第一家湘裕炼锡厂,也是由士绅合股投资,由张祖国、朱恩缙等股东组成。在士绅控制的湖南矿务总公司中,由总公司直接委托绅商采办的就有 22 处,下属三路由绅商开办的矿产有 56 处,加之山主请求归公核办的 33 处矿产^[66],合计达 111 处。

同时,清政府还饬令邮传部及各省兴办工艺局,兴办工场,鼓励各地兴建工艺技术学堂和实习工场,推广新技术。1903 年,商部接办中央工艺局,并扩充整顿。据统计,至 1907 年中央工艺局已全部开工,设有织工、染工、皮工、料工、绣工、木工、井工、藤工、纸工、铁工电镀、图画、画漆等 12 科。1908 年,中央工艺局有 12 名工师、44 名匠目、53 名工匠、392 名工徒,合计 501 人。

清末中央工艺局的创设及其实践,为推进湖南等全国民族手工业做出表率。据统计,1911 年前,湖南创设的工艺厂、工艺学堂就有 11 个。其中较为出名的有 1904 年刘司马创办的工艺局、永州创办的永州工艺局,以及 1906 年湘潭傅冠南创办的手工业实学堂、熊希龄创办的醴陵瓷业学堂、善化唐济时创办的求是学堂。此外,还有长沙理化工艺实业学社、官办工业学堂、省立艺徒学堂等等。这些工艺学堂的创办为民族手工业发展储备了人力资源和技术工,而工艺局的创办则有助于各部门对民族手工业的管理和指导,推动区域之间手工技艺的交流。甚至一些工艺学堂还自设工艺厂和工艺局,成为专门的民族手工业工场。

在清政府的这种倡导下,湖南政府引进西方先进的种植技术,并进行机器生产。其中,为发展蚕桑业,1898 年,湖南士绅梁肇荣等集股不但筹设“梁肇荣水利公司”,推广新法养蚕,而且还设立机器制茶公司。这些机器制茶和新法养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湖南近代民族手工业的发展。为“考求新方法为宗旨,以改良湖南农业日有进步”^[67],于是 1903 年长沙成立了农务试验场。1904 年 3 月,农务试验场正式开办,不及一年,不仅试养了一次春蚕,还陆续种植了 7000 株桑树,甚至还采用英国肥料种植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1905 年,湖南农务局从浙江选购 70 多株湖桑,种植于长沙北门外,并劝导农民分购移植他处^{[68] (pp. 89-90)}。1906 年,常德设立“常德蚕桑学会”,“召集艺徒教以蚕桑新法”^[69]。同年,湘潭县创办种植公司,种植桑柳。1908 年,湖南政府创办“湖南农业学堂”。

食盐专卖是政府既定的国策,但太平军占领南京后,“私盐”逐步合法化,从而使四川、广东的“私盐”不断涌入湖南等地。基于此,1853 年,户部奏称,凡是川、粤之盐输入湖南境内,“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不必由官借运”,同时还令川、粤各督抚“招来商贩,远赴邻村”^{[68] (p. 397)}。随着“私盐”在湖南的运销,由于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方面,“私盐”都占优势,以至于淮盐逐渐失去原有的主导地位,“淮盐久不到湘,已成废岸”。咸同战乱之后,即使清政府极力采取行政手段,试图重建淮盐的专卖,但却遭受湘军势力的抵制。当时,曾国藩指出,取资于川、粤盐厘的两湖军饷“为数甚巨,未使骤然禁绝”,因而主张根据邻省川、粤盐价定义每斤八文,江苏盐“每斤完厘九文半,以充鄂、湘军饷”^{[2] (pp. 3-4)},从而促进了食盐产销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中国近代工业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李鸿章等人开启的洋务运动,而湖南近代工业则始于 19 世纪末洋务运动结束之时。1895 年 8 月,湖南巡抚陈宝箴从厘金局提银 50 万两,创办了官办的湖南矿务总局,相继在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平江黄金洞金矿开采。1896 年,陈宝箴又创办了湘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宝善成机器制造局,这些都是湖南近代工业兴起的标志。之后,在政府的鼓励下,不仅促进了民族手工业的发展,还推动了湖南工业化进程。

辛亥革命后,在政府发展实业的倡导下,湖南民族手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1912 年,英国驻长沙领事基尔斯指出,自辛亥革命后,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其最大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使湖南在工业上“既不依赖外国,而且不依赖其他省份”^{[70] (pp. 849-850)}。据统计,在 1912 年湖南海关出口总值中,民族手工业出口总值达 2899158 海关两,为全省海关出口总值的 22.5%,同年矿业总值为 428922 海关两,占全省海关出口总值的 3.3%,即民族手工业出口总值是矿产总值的 670%^[20]。

五、特殊因子:军需的促动

近代军事需求是民族手工业得以变动的特殊因子,既打乱了既有的商品经济流通,但同时又促进了军需民族手工业的发展。对于湘军与湖南经济的变化,有学者已进行了某些研究,认为湘军的兴起“导致了湖南经济、社会结构根本性蜕变”^[71],但尚未结合湖南民族手工业的变动进行论述。实际上,太平天国运动不仅促进了湖南经济、社会的蜕变,还促进了湖南民族军火、军需棉布等手工业的发展;不仅使数十万湘军的“军器多由湖南办运”,还使湖南于 1852 年创办了湖南炮局和船局,专门制造三板、长龙、快蟹等战船,生产重达八九千斤的大炮^{[2] (pp. 117-118)}。据统计,湘军每年所需数百尊熟铁炮,“大部分用来装备曾国藩的水师战船”^{[72] (p. 69)}。

湖南枪炮民族手工业的发展继而推动了湖南冶矿业的发展。咸同年间,新安、茶陵等四县铁厂“不下百余厂,熔成六七千石”,合计年产 100 万石,可解决数万人贫民的生计。1866 年,长沙出现了 48 个铁厂,加之陶家老屋、乌鸦坝、沙坪、龙飞岭“皆是”兼营军火作坊的钢铁之地,“承揽湘乡人熬硝”,而这些“硝户必湘乡人”,以至“所居必铁铺”。据统计,湘邑年销硝量 2500 斤的产品均为硝户承办煎熬^{[72] (p. 124)},领取工资。咸丰年间,仅湘潭的“苏钢”作坊就达 40 多家,但光绪中叶,因洋货的输入,遂减至 5—6 家^{[22] (p. 367)}。同治元年,湖南不仅“仍在桂阳州开矿采办”,还在湖南四处寻找新矿源,甚至广泛收买矿产。1858 年,湘乡知县奏请在县内陈家山“试采磺砂”,采获 5.68 万斤。同时,湘乡还在安化至娄底沿岸的煤垅之地获取磺砂,“飭令随时收买解省供用”^{[2] (p. 302)}。

除了制造枪炮、战船之外,湖南火药局还制造火药、铅弹。由于郴州、桂阳等地所产的黑铅、硫黄“原料充足”,每年弹药产量达数 10 万斤,以至于湘军所耗用的火药“大部分是由这个厂供给的”。如 1858 年仅一次接济广西的火药就达 7.7 万多斤^{[72] (p. 70)}。特别是曾国荃炮轰南京之时,所需军火量甚巨,“四万斤火药仅敷半个地洞之用,则十余洞纯须三十万斤”。同时,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二十余日已解至十二万斤”^{[73] (p. 1122)}。这些火药几乎完全仰给于湖南,使曾国藩大营“着东征局每月不过得药七八万斤”^{[73] (p. 1006)}。据此可知,湘军年均所需火药近 100 万斤。

咸同战乱时期,由于湘军所需的衣服、帐房、旗帜等大增,且主要仰给于湖南,从而促进了湖南纺织业的发展。曾国藩在湘军离省之处就指出:“永丰大布,厚而不贵,吾意欲办好帐房五百架,又宽又大结实,以为军士寒天之用。”^{[73] (p. 273)}曾国藩的这一号令,从而成为湘军采买军服、帐房的定制,致使左宗棠远征西北之时,觉得甘肃所制的军装不但价昂,而且质量低劣,根本“不如从远省购运之费省工良”,继而指派专员赴湖南采买。从湘军及左宗棠西北远征军的消费来看,所用帐房、军服、旗帜等每半年一换,而数十万人每年又须两次的换季衣料,因而所需纺织的商品量较大。醴陵在“营业盛时”,每年输出的夏布达 100 万元以上,粗细夏布约 20 万匹,而浏阳的夏布每“岁售银百万”。

在进军新疆之时,湘军无意间打通了中亚的商路,使湖南茶业贸易得以发展。其中,1880—1889 年是湖南茶业在中亚贸易的“最盛”时期。当时,两湖每年外销茶叶值 1000 多万两,而湖南茶销量就占 60%^{[74] (p. 163)}。茶叶贸易的发展继而使湖南商人不断成长、壮大,使湖南从之前的“经商服贾以至外省者亦不数见”^{[39] (p. 79)}逐渐发展成为“经营运销淮盐和茶叶起家”的巨商,甚至其势

力已发展成为“夺取晋茶大利,擅商务大宗”^{[39] (p. 172)}。

不但湘军如此,而且清末革命军的兴起也带动了湖南民族手工业的发展。在较有影响的民族手工业者的推动下,有的民族手工业作坊还成为了革命机关,如长沙“义昌祥成衣店”就是联络革命派的重要机关。革命党人经常在“义昌祥成衣店”召开会议,分配该店缝制军装,既配合了革命,又促进了该店的发展。该店店主不仅亲赴革命工作,还动员成衣店的雇工作为革命的后勤人员

^{[61] (p. 103)}。

当然,战争对民族手工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置疑。太平天国起义不仅影响了商路的变动,还影响了商民的生计。商路受阻,作为产米之乡的湖南,“米粮无路行销”,农民买一石谷的收入,“买盐不能十斤”,即使终年辛勤耕作,亦“求免茹淡之苦而不得,如是而弄困”。简言之,“商贩贸迁阻滞,生计萧条,向之商贾今变而为穷民,向之小贩今变而为乞丐”。商民生计受到影响,继而使社会更加混乱,盗贼渐多,小民“失业无聊,以饥寒而流为盗贼者,亦复不少”^{[21] (p. 592)}。

综上所述,虽然商人的助推、军需的促动等因子影响了商路的变通和商品化的发展,但是在某些方面却无意间起到推动作用。随着商品化的发展、商路的变动、商人的助推、政府的鼓励和军需的促动,晚清湖南民族手工业在受奸商、行会和战争影响的同时,还是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甚至还推动了整个湖南近代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

参考文献:

- [1]王定安.湘军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3.
- [2]杨奕青,等.湖南地方志中太平天国史料[M].长沙:岳麓书社,1983.
- [3]吴敏树.枞湖文集:第20卷·巴陵土产说[M].
- [4]黄凝道,等修.谢仲坑,等纂.岳州府志:第12卷·物产[M].乾隆11年刊本影印。
- [5]龚胜生.清晚期两湖纤维作物的种植与分布[J].古今农业,1995(2).
- [6]熊元彬.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 [7][嘉庆]巴陵县志:第14卷·物产[M].
- [8]刘采邦,等编纂.长沙县志:第16卷·风土[M].
- [9][光绪]耒阳县乡土志:下编·物产[M].
- [10][同治]衡阳县志:第10卷·货值[M].
- [11][嘉庆]宁乡县志:第4卷·赋役志,物产类[M].
- [12][嘉庆]善化县志:第23卷·物产[M].
- [13][乾隆]清泉县志:第6卷·食货志一,物产[M].

-
- [14]曾继枢,黄启昌.长沙经贸史记[M].长沙:湖南文史出版社,1997.
- [15]刘云波,李斌主编.湖南经济通史·近代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 [16][道光]辰溪县志:第21卷·矿产[M].
- [17][嘉庆]张云璈,等.湘潭县志:第39卷·风俗志[M].
- [18][光绪]武冈乡土志.商务志[M].1908年版线装本.
- [19]湖南省岳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岳阳百年大事记(1840-1949)[M].上海:国际展望出版社,1992.
- [20]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贸易志·贸易综述商业[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 [21]刘世超编.湖南之海关贸易[M].长沙:湖南经济调查所,1934.
- [22]彭泽益.中国近代民族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3]朱羲农,朱保训编纂.湖南实业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 [24][光绪]邵阳县乡土志:第4卷·地理志,商务[M].
- [25]陈先枢,黄启昌.长沙经贸史记[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
- [26]佚名.湘产纸料全被舶来品浸销[J].国货月刊,1936(43).
- [27][同治]浏阳县志:第7卷·食货三物产[M].
- [28]曾赛丰,曹有鹏.湖南民国经济史料选刊:第2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 [29]湖南省新化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新化县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
- [30]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市志:第7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 [31]湖南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湖南工人运动史[M].北京:工人出版社,1994.
- [32]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轻工业[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 [33]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通鉴[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 [34]湖南茶事试验场.湖南茶产概况调查调整报告书[R].内部发行,1935.
- [35]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1.

-
- [36] [光绪]湘潭县志·货值十一[M]. 1889 年刊本.
- [37]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 桐油[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1.
- [38] 刘泱泱. 近代湖南社会变迁[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 [39]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1 卷[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57.
-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 太平天国资料[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 [41] 朱自振编. 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1.
- [42] 彭伯鉴. 津市市场今昔[C]//津市文史资料: 第 2 辑. 1985.
- [43] 李石铎. 湖南之桐油与桐油业[M]. 长沙: 湖南经济调查所, 1935.
- [44] 光绪二十九年岳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C]//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 下册. 吉林: 北华大学影印, 1990.
- [45] 商务[J]. 东方杂志, 1904(3).
- [46]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撰出版. 中国实业志·湖南省: 第七编[M]. 内部发行, 1934.
- [47] 宣统元年岳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C]//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 下卷. 吉林: 北华大学影印, 1990.
- [48] 湖南政协文史委员会. 湖南历史资料(1979 第 1 辑)[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 [49] 张朋园. 中国近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M].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1983.
- [50] 刘世超. 湖南咨议局第一届报告: 第 4 卷[R]. 湖南图书馆藏.
- [51] 黄云照. 杨竹秋先生及杨恒源油号简史[C]//洪江政协. 洪江文史: 第 4 辑, 2000.
- [52] 习清尘. 洪油业的盛衰[C]//洪江市工商业联合会编. 洪江工商联史料. 内部发行, 1988.
- [53] 吴觉农. 湖南茶业视察报告书[C]//中国实业: 第 1 卷第 4 期, 1935.
- [54] 胡林翼. 复李香雪都转[C]//胡文忠公遗集: 第 83 卷. 武汉: 崇文书局, 1875.
- [55] 湖南茶产概况调查报告书: 上册[R]. 1935.
- [56] 本省近事·城陵矶近讯[N]. 湖南官报, 第 409 期.
- [57] 光绪二十八年岳州口华贸易情形论略[C]//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 下卷. 吉林: 北华大学影印, 1990.

-
- [58]邵元冲. 焦大鹏传[C]//唐卢锋编注. 革命诗文选. 南京:正中书局, 1941.
- [59]邹永成口述, 杨思义笔记. 邹永成回忆录[C]//近代史资料, 1956.
- [60]湖南省银行经济研究所编. 湘东各县手工艺品调查(二)[M]. 1942.
- [61]周秋光, 等. 湖南社会史[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 [62]虞和平. 商会与中国早期近代[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 [63][清]胡文炳. 楚南鸿爪·风俗[M].
- [64]左宗棠. 左宗棠全集·奏稿六[M]. 长沙:岳麓书社, 1992.
- [65]宁乡县志:第6卷·食货志下, 工商[M]. 1948.
- [66]蒋德钧. 求是斋类稿:第6卷·集股购地开矿稟[M].
- [67]湖南农工商情形记略[N]. 商务官报, 第16册, 1906-09-22.
- [68]实业[J]. 东方杂志, 1905(5).
- [69]实业[J]. 东方杂志, 1906(3).
- [70]汪敬虞.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7.
- [71]梁海琼, 高钟. 湘军兴起与湖南近代经济之蜕变[J]. 求索, 1989(4).
- [72]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二次修订本[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 [73]曾国藩家书(二)[M]. 长沙:岳麓书社, 1985.
- [74]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第1卷[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